

落马官员的精神世界

“大师”王林倒下之后,牵出了刘志军、胡长清、丁鑫发、宋晨光等一长串高官的名字,他们都曾是“大师”的粉丝。每个成功的大师背后,都站着几个问题官员,鲜有例外。

关于高官腐败,反腐败理论研究者邵道生曾提出著名的“信仰危机”说。他认为,“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

“信仰”问卷

只有探究官员的心理变化,才能得知贪腐在官员个体身上如何发展演进、由微而著的历程。

从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时为江西行政学院政治学系主任的肖唐镖借在中部某省省委党校授课之机,对六个领导干部培训班进行了抽样调查。共投放匿名调查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571份。

问卷中设计了直接触及“贪腐”的问题。在“任用干部的风气”上,竟无一人认为“风气很正”,认为“风气比较正”的仅占18.6%。

在“任用干部风气不正的主要表现”问题上,74.8%的人选择“拉关系、跑官”;55.3%的人选择“任人唯亲、分派分线”;46.8%的人选择“考察不实”;43.1%的人认为在干部任用方面“决策不民主、个人说了算”;28.4%的人选择“买官卖官”。“现在提升职务关键要靠什么?”75.1%的回答选择“与领导的关系”,而只有

17.0%的人选择了“资历”。

“干部任用和管理中的问题,于此可见一斑。”肖唐镖总结道。

涉及官员信仰状况的问题是“您觉得共产主义能否最终实现?”66.9%的人回答“有可能实现”或“一定能实现”,然而,选择“不可能实现”或“说不清”的人也占27.4%。在“是否希望我国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71.5%的人选择是,有20%左右的人选择“不希望”或“说不清”。

他从答案中看到,“在地方领导干部队伍中,多数人员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信仰,但多元化的情形却已经发生。”

“信仰的失落,已在当代官员心里种下了价值观迷失的祸根。”肖唐镖表示。

警示案例

纪委系统常以现实案例为原型拍摄专题片,进行领导干部教育警示。同时,专题片会把落马官员分成不同类型,其中就有一种“信仰缺失”型专题片。

其中,“信仰缺失”的专题片中“草原巨贪徐国元”最为引人瞩目。

2009年,内蒙古赤峰市原市长徐国元贪污受贿案公开审理。据办案人员介绍,徐国元在赤峰市任市长6年间,涉嫌敛钱财约3200万元。

2006年,有关部门对徐国元开始初查,他一边编造虚假事实、伪造书证,为其违纪违法所得捏造合法来源;一边向外转移藏匿现金和贵重物品。他甚至把200余万元现金和珠宝装在一个密码箱

里,从内蒙运至云南省的一座寺院里,放置在寺院住持的住处,密码箱的钥匙竟藏匿在了佛像耳朵里。

该办案人员称,徐国元每收到一笔赃钱,都要先在“佛龛”下面放一段时间。由于心里有鬼,在他隐匿赃物的箱包中,箱包四角也各摆放一捆钞票,中间放置“金佛”或“菩萨”,祈求“平安”。

实际上,徐国元并不是真心信佛,也不想诵经忏悔,而是心存侥幸。“徐国元明知自己罪不能赦,还幻想寻求佛的保佑。他在家中设立佛堂供奉佛像,夫妻俩每天烧香拜佛。即使进了监狱,也每日手捧佛经念诵”。徐国元信佛无非就是寻找寄托,祈求保佑。

“迷信”的根源

在肖唐镖大胆的“信仰”问卷之后,随着贪腐高官不断落马,贪官的心路轨迹愈加暴露于大众,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研究目标转向官员的“内心世界”。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涂谦以十六大以来落马的72名省部级官员为样本,分析了他们的基本特征。他得出的结论是,“‘钱、权、色’是腐败的高发领域,腐败的高发年龄段为52岁至62岁。”他的调查显示,在72名腐败高官中,有22人“长期包养情妇、道德败坏”,占33.3%。耐人寻味的是,不少包养情妇的官员系因为情妇谋取利益而落马,亦有不乏被情妇举报导致罪行暴露的高官。涂谦认为这是掌握权力者的贪欲超越伦理底线所致,该现象折射出

的是贪腐官员价值观的沦落。

在对贪腐官员的研究成果中,另一项触及精神信仰层面的结论是:很多贪腐官员有着异于常人的“迷信”思想。近年来,此类官员迷信事件更是屡见报端。如河北高邑县委大院门口飞机堵路事件,江苏宿迁“骆马湖”更名事件,长春某法院辟邪宝剑事件。最近热传的是刘志军案发前每天烧香拜佛以及在办公室摆“靠山石”的事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程萍对表示,选人用人制度上的不正之风,是造成官员迷信的重要原因之一。贪污受贿、买官卖官等腐败现象盛行,在有些地方和部门,权钱交易使得正气受到压抑,一些官员痛感不能把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

“在不正之风的暗示下,一些官员产生沉重的焦虑感、迷茫感和无力感,把升迁的希望寄托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鬼神身上。”程萍说。

“(今天)这些堕落的官员(的心理和思想)已不能用常人的标准来度之,已是极度的荒唐与张狂。”肖唐镖指出,十年来贪腐官员的表现有三:一、贪腐行为已经无以复加;二、干部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没有体现出相应的防腐、反腐举措和积极性;三、所幸的是,公众监督媒体监督已经成为反腐的利器。

“如果说其他措施未令贪官恐惧,公众和媒体起到了这个作用。”他说。

《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30期文/徐智慧 王全宝

开国将领的孩子 大多过着平民生活

本文摘自《一生紧随毛泽东:回忆我的父亲开国上将陈士渠》,金汕等著 陈人康口述

我还感到,看老干部是不是廉洁,他们的子女状况便是一个准确的信号。

我60年代在十一学校上学,这里离各个军队大院很近,所以是一座典型的军队干部子弟学校。全班40多位学生,只有两个同学的父亲是大校,其他都是将军的子弟。

班里有叶帅的儿子叶选廉,还有五六位上将、大将的子弟。前几年我们聚会了一次,年近50岁的人想起儿时的生活不禁唏嘘。

如今我们已经变老了,但是真正能和父辈业绩相媲美的几乎没有。连局级干部或企业老总,充其量只有五分之一。有个别的已经下岗或者做了传达室看门的,这是严峻的现实。

我三哥陈人俊有次和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聚会,得知他也是一介平民,也是靠正当收入生活,开的是已经很旧的普桑,但他感到很踏实。

我们与海军上将王宏坤的儿子王新中也很熟,他们开了一家公司,业绩不错。用他的话来说:“这个公司没有用过老爷子的一点权力,老爷子也帮不上忙。”

还有我的朋友、西藏军区司令员谭冠三的儿子谭戎生,他目前已经退休,就象一个普通的退休老人,在早上晨练,读书看报,颐养晚年。谭冠三临终前向党提出了唯一的请求:“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谭冠三逝世后,做为长子的谭戎生自愿到西藏去,继承父辈未竟的事业。谭戎生的四弟是战争年代因父母无法带走而留给根据地老乡的,至今还在河北农村当农民。因为谭将军在解放后说:老区的人民在我们危难的时刻收留了我们的孩子,我们不能忘本,是人民把他养大,他也要回归人民。

现在谭戎生还要不时帮助在农村生活困苦的弟弟。

前不久,我的二哥带我见了一个朋



开国上将的子女到井冈山追寻父亲的足迹

这个朋友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他身材不高,瘦弱的身躯已经有些驼背了,满头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依稀让人感到他受过不少苦。

二哥告诉我,这是50年代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的儿子邓瑞生。我既惊诧也不惊诧,惊诧的是他似乎连高干子弟的痕迹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不惊诧的是,过着普通人民生活的高干子弟太多了,他们的父辈大多早已远离了权力。

我问邓瑞生大哥:“邓子恢被‘诬陷’,您也跟着受苦?”邓瑞生说:“父亲挨整,我们家就成为另类。我也从北京被安排到湖南常德一个中学教书。文革中我更是战战兢兢,我是中央一个被批判过的重要右倾人物的儿子,那在小地方简直不得了。尤其文革中成天念毛主席批判‘小脚女人’的语录,这段话又是针对我父亲说的,我的压力该有多大!”

邓瑞生接着说:“父亲有很多老战友,我那个时候也不敢找,害怕株连人家。1970年我听说王震将军来常德,就硬着头皮去找他。宾馆的警卫一看我穿的土里土气,根本不相信我的父亲会认识王震。我告诉警卫,让他告诉王震,我是邓子恢的儿子,王震听说后说,‘把他请进来,他是邓子恢的儿子,也是林(伯渠)老的儿子’。”

我不解地问邓瑞生:“您怎么也是林伯渠的儿子?”

原来在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即将开始。邓子恢与妻子黄秀香看着才出生3

天的儿子不知如何是好,恰好林伯渠和妻子范乐春所生的儿子也同样大小,他们咬牙把邓瑞生与林老的儿子一同寄养在会昌范乐春亲戚家中。残酷的战争,使两位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夫人先后去世。

1949年9月,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邓子恢听到江西解放的消息,提笔给驻扎在赣州的同乡、时任48军政委的陈仁麒写信,托陈仁麒帮助他和林伯渠找寻孩子。经过陈将军的努力,分别15年的儿子终于找到了。

建国后,做为副总理的邓子恢住进了中南海,他的儿子和林伯渠的儿子经常一起上学,也在中南海的食堂就餐。后来连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都奇怪,为什么林伯渠的孩子那么像邓子恢,而邓子恢的儿子与林伯渠如同一模所铸。

朱德对邓子恢说:“我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邓子恢却笑着说:“孩子搞错了,就错了嘛,不要紧,林老没有孩子,我孩子多,都是革命的孩子,不要换了。”

后来,待中央办公厅派人到会昌调查,澄清真相,他们才将孩子换回。

几十年的时间过去,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眼前的这位老人当年是进出中南海的孩子,是在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面前来来往往的红色后代。如今72岁的他,60年代末下放到湖南,至今仅仅有600多元的退休工资,遇到生病也不敢吃好药。

几年前,他回北京已无落脚之地,还是他给一位中央领导写了信,农业部根据情况给了他一间40多平米的独居。他已经非常满足了。

我们这些高级将领的孩子都很怀念少年时代充满理想的日子,尽管那种日子有很多缺陷,但是要求干部和人民群众同甘苦的信念是永远不该丢弃的。

一位比父亲级别还高的老革命的儿子说:“我们当今有很多做法是与父辈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理想背道而驰的。世上没有不沉的船,我们至少要洁身自好地不去拆船。”

中国网 2013.8.1

大学校园的贫富分化现象

10年前,富一点的大学生一个月500元钱生活费,穷一点的200到300元。如今,前者是宝马车开进校园,后者只是将200元略提高了一点……当家庭的经济资本悄无声息地通过高等教育进行代际传递,会给校园和大学生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变化?对“知识和奋斗能够改变命运”的坚信,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生?

在由消费文化所诠释的生存逻辑中,寒门子弟与富家孩子的阶层性逐渐显现,而且逐渐出现一种难以弥合的紧张关系。在全世界范围来看,家庭富裕学生获得成功的几率远远高于家庭困难学生,这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消费话语的普遍侵袭下,大学食堂、校园社团、运动空间、娱乐场所等校园空间其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许多空间完全抛弃了家庭困难的孩子,甚至演化成为一种赤裸裸的“富人的游戏”。

校园贫富分裂现象的加剧,使得寒门子弟的情况或许更为糟糕,甚至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恶性循环。消费话语限制了他们的社交范围和交往能力。由于家境贫困,他们对学习工具和学习途径的占有极为有限;为了维持生计,他们不得不奔波于各种打工场合,校园生活和大学体验注定是“不完整的”;受到交往范围的限制,他们对社会资源的占有能力也非常微弱,这无疑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日后的就业前景。

当前,应对愈演愈烈的贫富分裂现象,大学本身必须有所作为。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防止因贫富分化而出现的各种对立情绪或消极情绪;公平开展奖学金和助学金工作,推动助学贷款和学费减免等扶持计划,提供更多勤工俭学机会和社会实践平台,帮助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走出经济困扰……所有这些,既是大学工作的一部分,也是校园文化建设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中国教育报》2013.7.29 文/刘涛